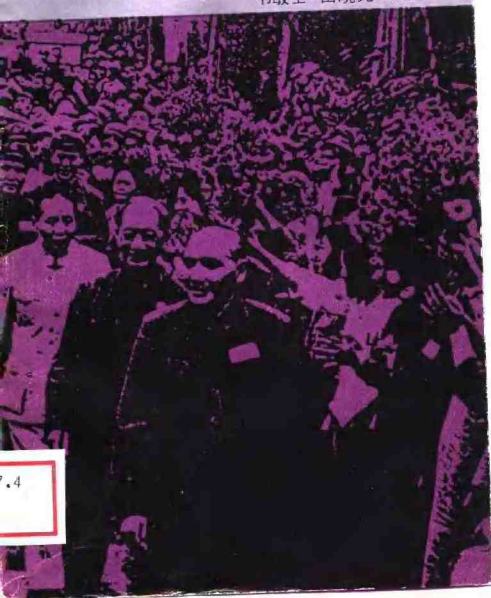


劉鄧大軍進軍西南

韦敏士 田晓光 编



7.4

责任编辑 张德尚
封面设计 吴庆渝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韦敏士 田晓光 编
刘邓大军进军西南

重庆出版社出版，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*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12 字数 213 千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000

*
ISBN 7-5366-0847-0/E·2

定价：3.20元



这是1949年进军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。

左起：邓小平政委、张际春副政委、刘伯承司令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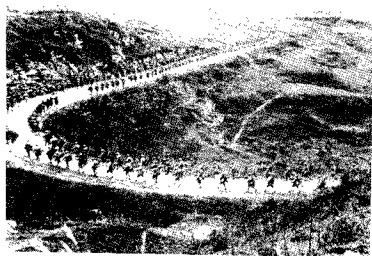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由陕入川部队的贺龙司令员(左一)、王维舟副司令员(左三)、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(左二)在研究作战计划。



1949年10月20日，南京市人民热烈欢送第二野战军出发进军西南。这是张际春副政委向群众挥手致意。

（孙侯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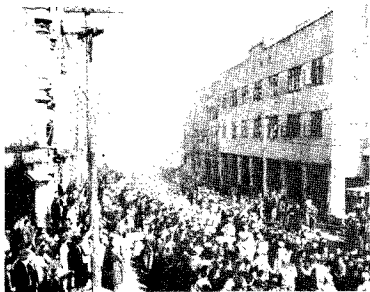


某部指战员克服天雨路滑等困难，日行180里，追击逃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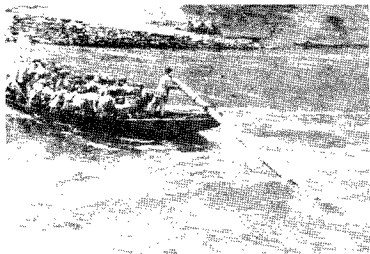
（高悦摄）



我军解放遵义时，
少年儿童给战士送水。
(王敬琛摄)



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。17军进入贵阳市，受到市民夹道欢迎。
(王云琪摄)



入川先头部队抢渡乌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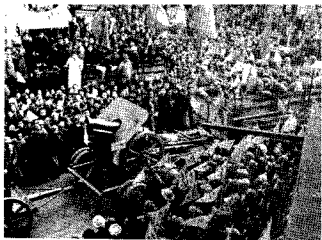
(高帆摄)



1949年11月30日,我三兵团主力和四野47军解放重庆。

这是11月31日举行入城式,受到市区群众热烈欢迎的情景。

(高帆摄)



1949年12月30日,我军在成都举行入城式,受到群众热烈欢迎。(杜荣春摄)



1950年2月21日,昆明12万群众集会庆祝昆明解放。这是4兵团陈赓司令员(左)、宋任穷政委(右)接受昆明市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献旗献花。(袁克忠摄)



藏胞民工抢修河道,支援我军进军西藏。(胡轮翔摄)



1951年4月,以阿沛·阿旺晋美(左)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谈判路过重庆时,受到邓小平(右)等西南军政首长以及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(王云琪摄)

解放大西南之战（代序）

李 达

（一）

1949年春末，国民政府拒绝和谈。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“向全国进军”的命令，势如破竹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攻占了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杭州、南昌、太原、西安等重要城市后，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并不就此甘心。它们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下，绝望地进行挣扎。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积极筹划“坚持”，蒋介石又从幕后跳到幕前，在美国议员诺兰的陪同下，时而台湾、广州，时而南宁、重庆，到处活动。他准备把退集在华南、西南、西北、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队，全部组织起来，以白崇禧、胡宗南两个仅有的集团为骨干，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。在华南地区，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队，组织“湘粤联防”，阻我进军两广。在西南地区，以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的部队扼守秦岭、巴山，防我由陕入川；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，防守川东门户；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。打算以川康云贵为后方，割据西南，建都重庆，等待国际事变，卷土重来。一旦上述计划破产以后，即退往云贵，再无法存身时，则逃亡国外。

• 1 •

毛主席指示全军，在继续进军时，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，应采取大迂回，大包围动作，断其后路，先完成包围，然后再回打之。毛主席并提出，在军事打击的同时，必须兼用政治方式。在作战部署上，确定：以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，于1949年10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，继而迂回白崇禧部，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，尔后西出昆明；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，与广西作战的同时，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，从东南面直出贵州，进占川东、川南，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；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，在贺龙司令员，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，积极吸引和扣留胡宗南于秦岭地区，待二野断敌退路时，迅速南下，由北面直扑成都外围，会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四川盆地。

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，是使蒋介石100万人马插翅难飞的一着。为圆满实现毛主席所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，必须首先给蒋介石造成错觉，因之，在军委统一部署下，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、邓、贺诸首长指挥下，并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“迷魂阵”。

先是1949年6、7月间，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我湖北军区部队，对川鄂边之敌，积极展开佯动，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——巴东；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，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，重创守敌98军，并攻占平利、安康等城；8月底至9月初，集结在秦岭北麓的18兵团等部，开始向敌秦岭防线实施佯攻，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。10月，当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，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南京人民热烈地欢送第二野战军北上。一列列的火车，从浦口开出，从津浦

路转到陇海路。我军到了郑州，人民又在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，新华社发出了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讲话的消息。

蒋介石原来就有这样的判断：认为我军入川的话，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，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。他认为：在川贵边方面，由于地势险要，交通不便，大兵团行动困难，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，他判定：“共军不会舍近求远”去碰白崇禧。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，又有陇海路，和背后的老解放区，补给问题较易解决。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以来在鄂东、陕南的一系列行动，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，证明他原来判断的“正确”。于是，他急忙调兵遣将，命令它的主力集团胡宗南三个兵团，依靠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，并沿白龙江、米仓山、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；又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，在川鄂边建始、恩施、巫山、奉节一线布防，扼守川东门户；同时还将罗广文兵团控置于南充、大竹地区，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。蒋介石并令白崇禧、胡宗南及川境诸“将领”，密切合作，背靠云贵，组成所谓“大西南防线”。

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，我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，正浩浩荡荡地向湘、粤、桂地区急进，打算夺取广州，并准备在衡（阳）宝（庆）地区，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。这时我第二野战军的部队，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，乘机以秘密和公开两种面貌出现，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，向面南进军了。我4兵团在四野统一指挥下，由赣南向广东进击；5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，由上饶隐蔽地向湘西；随野战军指挥机关北上的3兵团，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。4兵团和5兵团，在开进途中，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。这

时二、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：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，锣鼓喧天，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，不显踪迹。在武汉，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：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，这很好，在武汉，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们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，等过了长沙，就连这点都要避免，越秘密越好。我们正是要在四野的翼肘下，实现出奇制胜的企图。

蒋介石正心神不定，四野在衡、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。在此同时，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三、五兵团，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仍按兵不动。待攻占广州，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后，才开始向预定方向开动。而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，则仍伴动，作试探性的进攻。但在兵临汉中城下时，则又进展迟缓，以至攻而不破，以稳定蒋介石的固川心理。被装进“迷魂阵”中的蒋介石，这时仍企神贯注于川北的秦岭、巴山防线。

(二)

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、大包围部署，是一个“关起门打狗”的决策。这个门既不能早关，也不能迟关。正如我们所料，10月14日晚，当南线我军刚刚占领广州不久，李宗仁及其国民政府的残余，便急忙跑到重庆。其他各地乱七八糟的敌人，也象一群失散的鸭子，纷纷向西南流窜，甚至连过去远在东北地区的“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”总指挥赵洪文等部，也先期逃到四川了。我们秘密隐藏在湘西地区的野战军主力，大张挾伐的时机到了。按照毛主席的预先部署，刘、邓首长立即命令5兵团结合3兵团的一个军为左翼

部队向贵州进击，要他们“一刀子插到贵阳”，接着直取毕节、遵义，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，然后向川南兜击；同时令3兵团主力结合四野一部为右翼部队，向川东南进击，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集团；我4兵团部队则从广州乘胜西进，迂回向广西逃窜的敌人，断敌通往海上的通路，协同四野主力会歼白崇禧于广西境内。

11月1日，我二野的5、3兵团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从敌人意料不到的，也是敌人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黔、川部分，突然挺进。于10日之内，连续解放了筑远、三德、秀山、酉阳、恩施等城。这时蒋介石才慌了手脚，急令罗广文兵团向川东增援，以配合宋希濂集团，依托乌江，阻我西进；令何绍周兵团坚决死守，确保贵州。但是，为时实已太晚。我各部队不仅行动突然，而且轻装疾驰，每日以百里以上的速度，昼夜兼程。他们排除各种困难，克服一切障碍，越过许多云雾弥漫的山峰，涉过急湍的河流，从敌人认为不可通过的地区，杀奔贵阳和遵义，逼近川、鄂边境。并在成丰、黔江地区，歼敌14兵团大部，俘敌兵团司令钟彬。蒋介石这时一面勒令宋希濂和罗广文凭借乌江天险阻我前进；一面又将孙元良兵团由川东急调重庆外围布防，同时又将防守川北地区的胡宗南一个军，车运重庆。并准备在防不胜防时，向云贵撤退。

当蒋介石布防重庆之际，白崇禧则在他的家乡——广西境内，遭受着我四野大军的围歼。这时，我从左翼对敌实施战略迂回之5兵团等部队，在击退敌何绍周兵团的抵抗后，以突然神速的动作，于11月15日，攻占了贵阳市；接着我军越过层层大山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，于21日，攻

占了遵义城。然后一步不停，按照毛主席“插至敌后，断其后路，先完成包围，然后再回打之”的指示，向川南实施突击。

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册上，曾经有过两占遵义，伴攻贵阳的记载，那是14年以前的事，那是中国革命危机的关头，是毛泽东思想重新照亮中国革命前程的开始，是中国工农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。14年后的今天攻克贵阳，占领遵义，是人民解放军——以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无敌于天下的时代，是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候。14年前，蒋介石坐镇贵阳，耀武扬威，兴兵动师追歼北上的红军；今天他坐镇重庆，象一个几将输净全部家当的赌徒，两只眼正瞪着赌场上的最后一注。这一注还没有全部亮开，他就目瞪口呆了。我军攻占贵阳、遵义，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逃跑的道路；11月下旬，我3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从彭水等地分别突破乌江后，在南川地区歼灭了宋希濂、罗广文主力3万余人，形成直捣重庆的态势。但为了迷惑和滞留敌人，便利我左翼部队之迂回，我军又暂不去攻占重庆；我另以四野一部从涪陵北渡长江，向垫江推进，迂回重庆外围。蒋介石此时发觉大为不妙，乃于11月30日天不亮，爬上飞机逃向成都。我军当日解放重庆。接着我军又组织部队向成都方向急进。我从贵州向川南突击的左翼部队三个军，日夜不停，于12月初，占领了纳溪、泸州、自贡等地后，迅速向乐山、大邑、邛崃一线迂回。

骄横一时的胡宗南，不久以前还向蒋介石表功，说他三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，万无一失，说什么“共军多次猛攻秦岭，无一处被突破”。他原来不知，秦岭防线不是我军不能突破，乃是实行既定方针的“突而不破”，目的是牵着他

的鼻子，不让他过早地南撤，以便南线各部队，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。胡宗南看见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、南、西三面包围上来，方知上了大当，这才放弃他坚守近半年的秦岭、大巴山防线，急令他的三个兵团，向成都地区撤退，准备负隅顽抗。

这时，我屯兵秦岭北麓的华北18兵团等部队，分兵三路，在贺龙司令员亲自统率下，如猛虎下山，从秦岭猛扑下来，紧跟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。越秦岭、跨巴山、攀摩天岭和米仓山等山脉，进入四川境内。时逢大雪纷飞，战士们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，但却奋不顾身地猛力前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。在沿途人民特别是川北通、南、巴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热情支援下，部队情绪十分高涨。各追击部队的行列中到处唱着：“快快追，快快赶，不怕足肿不怕寒，赶到成都捉战犯。”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，悬崖隘路，栈道崎岖。李白著名的诗句：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，就是指的这条路。原想依托秦岭、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，万万没想到，现在这些天险、隘路，却都变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。由于我从北面扑下来的部队猛打猛追，终将南逃之敌后尾8万余人，尽歼于川北地区；接着我追击部队又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，至此，我军便从四面八方，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，全部关在成都盆地。

(三)

毛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，就曾向我军指出，在军事打击的同时，必须兼用政治方式——即以“北平方式”去